

# 恤民体道——林纾文章血性论研究

王婷

(兰州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林纾是晚清颇有成就的学者,在学术史与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且在译界占有一席之地,其诗文与译作中无不蕴含着血性这种精神气质。林纾思想内涵立足于对国家人民的关注、经世致用的提倡、社稷君主的赤诚及传统道德的维护。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根源于儒家文化,又与晚清时局和个人身体疾病等有密切联系。

**关键词:** 晚清; 林纾; 血性; 操守; 成因; 价值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8)02-0103-06

## Concerns for the people and advocacy of Confucianism ——A study of courage and uprightness reflected in Linshu's writings

WANG T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As a successful schola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n Shu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cademic and the ideological history, and assured himself of a place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All his poems and translations embodied such spirit as courage and uprightness. His ideas were based on his concerns for the people and the country, his advocacy of statecraft, his loyalty to the nation and the monarch and his maintenance of traditional morality. Among the various causes lea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his ideas which were rooted in the Confucian culture, the situat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his illnesses were the most significant ones.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Lin Shu; courage and uprightness; integrity; causes; value

清末,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了极大冲击与破坏。正如龚自珍在《尊隐》一文中所描绘的“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sup>[1]312</sup>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萧条与枯槁让人慨叹。国家主权的沦丧,激发了士人变革图强的雄心,以奕訢、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运动、康梁的维新变法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等相继爆发。这些变革,程度不同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林纾曾被人称为“前清遗老”“封建余孽”,实际上,他在前期对整个社会与西学的认知是走在时代前列

的,不仅译介小说向人们打开世界的窗口,还通过诗文的创作捍卫传统,显现出在大厦将倾之前,以一个清朝举人的身份所担负起的社会责任及个人价值的追求。这种价值追求深刻体现在他的“血性”文章当中。林纾,字琴南,号畏庐。张僖为《畏庐文集》作序言:“畏庐,忠孝人也,为文出之血性。”<sup>[2]562</sup> 高梦旦亦在《畏庐三集序》中言:“叙悲之作,音吐凄梗,令人不忍卒读。盖以血性为文章,不关学问也。”<sup>[2]642</sup> 二人论述切中肯綮。本文通过对血性内涵界定,结合前人有关血性的评价,把握在晚清独特的社会背景下林纾文章所显现的

思想操守及形成原因,以便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林纾,提升文化自信。

## 一

“血性”一词最初用于医学,传统中医认为血与气是身体各项机能运行的根本。“凡血与气,内荣腑脏,外循经络,相随而行于身,周而复始。血性得寒则凝涩,热则流散。”<sup>[3]165</sup>因此,古人非常重视对气血的调养,探寻种种养生之道。现存文献中,以血性形容人的气质性格,最早见于唐代的《吕子易说》:“臣之任才猷不足……然殫血性之诚,竭忠荃之效,谁得而尤之也?”<sup>[4]82</sup>至明清,则蔚为大观,特别是在小说当中,所论之人大多有相通之处。这种“血性”,是镌刻于血液、赋命于自然的一种价值追求。

有血性是不怕流血牺牲、勇于上阵杀敌的人,明人王锡袞就是这样的代表之一。其云“臣袞血性存,封疆惭大吏”,<sup>[5]393</sup>在国破家亡之际,用家财招募士兵,保卫南明朝廷。据《明史》记载,明末,清军入关,唐王、桂王先后称帝以抗清保明,然皆朝不保夕,后沙定洲叛变,锡袞被囚于贡院,“诡草锡袞疏上永明王,言定洲忠勇,请代黔国公镇云南。疏既行以稿示之。锡袞大恨,诉上帝祈死。居数日,竟卒。”<sup>[6]8553</sup>王锡袞的血性便是传统上所说的杀伐决断,保家卫国的“须眉志”。

不仅武将勇猛杀敌,保家卫国有血性,文臣也有独特的血性,最典型的代表则是杜甫。《唐宋诗醇》中引黄生对杜诗的评价:

《有感》五首,与《诸将》相为表里,大旨在于忠君爱国,休兵恤民,安边而弭乱,其老谋硕画,款款披陈,纯是至诚血性语。<sup>[7]372</sup>

这里的“血性”未尝不与杜甫“一饭未尝忘君”的形象相照应。值得关注的是,杜甫的“血性”中除了忠君爱国,又融入了儒家保民、安民的色彩,这在很多诗歌中都有表现。

综上所述,“血性”即具忠义之气而胸怀韬略,即孟子所谓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立天地间而不忘本,作为一种炽热的情感,在大一统的王朝下,忠君爱国往往是其不变的内涵。在传统儒家精神的引导下,以不同方式力图实现自我的价

值,彰显了历代人在维护国家利益面前所做出的选择。他们皆有所守,不随世俯仰,有风骨,有担当。

## 二

林纾所处的时代,正是旧的秩序已遭摧毁,而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起来的时候。在此混乱状态中,林纾并不随波逐流,而是对眼前的现实有着清醒的判断,明白该坚守什么、舍弃什么。张僖与高梦旦评林纾,皆言其文具“血性”,由此,我们不妨从林纾诗文形态的广博性中发掘他刚烈性情中所包含的思想操守。

### (一)对国家命运与生民苦乐的关注

“茫茫斜日下江河,醉卧残血当枕戈。”<sup>[8]260</sup>在清末动荡不安的社会下,林纾也有枕戈达旦、杀敌保国之志,然“头颅食肉不飞腾”。忠孝之人,当竭忠尽智。这种对国家深重的感情是自小时就镌刻在血液当中的,因而在清王朝岌岌可危之时,他用细腻的笔端写尽世态人情,揭开社会种种伤疤,以求思想的启蒙。这种价值追求正是出于对国家的赤胆忠心,是在君为臣纲思想之影响下力图挽救社会以延续王朝统治的表现。

光绪二十三年(1897),林纾仿白居易讽喻诗作了第一部诗集——《闽中新乐府》,以求指摘时弊、开启民智。在这部诗集中,林纾注意到社会中的很多病态与弊端,并力图把它们一一展现出来。

“方今小人之多,任事之难,在古实无可比例。”<sup>[2]569</sup>这动乱迭起、国将不国的现实,无疑给仍然沉醉于天朝上国美梦中的人以沉重一击。在官吏百姓“寿夭贵贱,惟聋子一言”<sup>[2]578</sup>的愚昧与迷信下,西学的传播所激起的涟漪不断扩展开来,使人们在艳羨坚船利炮的威力与声势、惊讶西方在工业革命中取得的一系列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意识到往日盛世辉煌的不再、当下革新的急切。

针对社会上的种种弊病,他提倡维新,在很多文章里面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同时认为应该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学先进的军事水平。“剖心哭告诸元老,老谋无若练兵好。须求洋将练陆兵,三十万人堪背城。”<sup>[8]269</sup>走改良道路,务求革新兵力,增强军队抵御能力。他在《赠伍昭宸太守序》一文中陈述了两种晋升显达的方式,一为传统科举,另一为精于西学,与洋人“争岁币、定盟约”,<sup>[8]84</sup>以

维护国家权益。林纾的友人伍君精于法律与外交,方今变法之际,林纾期望他正西学以消邪说。

## (二) 对经世致用思想的贯彻

在西方国家注目于自然力的开掘与科技的应用时,中国社会仍是“成千上万胼手胝足、辗转沟壑的小农背负着一代一代歌讴唐虞盛世,高谈名物考据或性心理义的士人。”<sup>[9]</sup><sup>12</sup>清代前中期,面对统治阶级严密的思想掌控与文化高压政策,士人不问世事,致力于考证与求知。然而,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眼见层出不穷的起义及列强对国家的瓜分,这些知识分子转而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用世的功用。

高梦旦所言林纾“以血性为文章,不关学问也”,实乃发现了林纾的特性。这里的学问主要是指考据学,从林纾一生专注于译书、教书、作画、为文的经历来看,他在考据学上确实很少涉及,且在古文写作中是不提倡的,甚至对此有贬辞:

一篇中填砌臃肿,一展卷已足生憎,  
何能即而寻味?<sup>[10]</sup><sup>6333</sup>

除此,林纾还极其倡导实践与阅历的重要性,力求将所学与阅历联系起来:

天下文章之美,非有所幸得也。必  
周历世事,详览变故。<sup>[2]</sup><sup>567</sup>

学者能溯源于古,多读书,多阅历,  
范以圣贤之言,成为坚确之论,韩、欧之  
法程自在,何必桐城?<sup>[10]</sup><sup>6335</sup>

在他送友人至巴黎、日本等赠别文中,亦反复阐述外出阅历可增强自身积淀之理,且于国有大益。因此,秉承先哲之圣训,基于社会生活之体验,方可深透通达。林纾不断强调实践之理,希望能在从传统的经典中汲取力量的同时,在生活中关注时事,秉承救国之旨,“心系国家”,自觉地把学问与救世联结起来,反对不切合实际的空虚之学、书斋之学,不做空学问。

## (三) 对社稷与君主的赤诚忠心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环境影响下,出生寒门的林纾自然是要走科举这条路来改换门庭、考取功名,以实现自我价值。“科举制度允许社会中的所有人通过个人努力而非通过门第、财富上升到最高层,从而使社会变得比较平

等。它鼓励社会流动并减弱阶级划分……中国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有教养的官僚集团,它支持政府而不是像西方的思想传统那样批评政府。”<sup>[11]</sup><sup>72-73</sup>在“三纲五常”礼教思想的支配下,这些知识分子无疑是政府虔诚的拥护者与爱戴者。

自32岁起参加礼部会试,风雨科举路,悠悠15载,屡次落第,人生飘摇如飘蓬,这对猖狂自负的林纾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在通过与一些官员的结交中,他看清了官场的黑暗与冷酷。在宦海浮沉与官场腐朽的现实面前,决计不再图仕进。但无论怎样,在清王朝灭亡后,这位前清举人是彻底失去了传统入世途径了。

在君主制的国家中,帝王代表着国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在共和制的国家中,林纾眼见山河破碎、军阀割据,在对袁世凯假共和的失望中,他加倍地怀念曾经的皇帝,甘愿做一位清朝“遗老”,声言以大清举人身份终其身。

在这种浓郁情感的支配下,频繁地拜谒光绪陵墓便成为林纾晚年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光绪陵墓仿佛已然成为他情感的寄托。自1913年起,拜谒光绪陵墓共达11次之多。林纾自己也曾对这一行为做过一番解释:

不过见故君丧亡,身为遗民,无可申  
诉。谒陵,即如展先烈之墓也……弟自  
始至终,为我大清之举人。谓我为好名,  
听之;谓我为作伪,听之;谓为中落之家  
奴,念念不忘故主,则吾心也。<sup>[12]</sup>卷二<sup>59</sup>

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认为造成林纾思想发生巨大转变的原因在于环境的影响:

戊戌之前,他是常与当时的新派的  
友人同在一起,所以思想上不知不觉的  
受了他们的熏染;后来,清廷亡了,共和  
以来,他渐渐的变成了顽固的守旧者。<sup>[13]</sup><sup>156</sup>

其实不尽然,传统社会以家庭和宗族为基本单位,在君臣社会体系下,儒家思想中的忠孝等观念作为精神支柱,成为士人对自身价值定位的向导,传统的伦理道德与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不断摩擦,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文化层面的变革渐渐消融了以血缘为中心的家庭社会的政治支撑。在这



种划时代之变化中,追求个人权利,男女平等思想显然与传统人伦关系是两条鸿沟,因此,是否从固有的圈子中跳出,以求新求变进而与时代同行,成为深受儒学熏陶的一代士人一种沉重的选择。林纾显然是做出了选择的,但这种选择是站在时代的对立面的,这就不免被人冠以“封建余孽”之衔了。

#### (四)对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坚守

年少时受业于薛则柯先生,学习欧文及杜诗,后转而学习制举之文,林纾深受传统思想熏陶,甚至甘愿充当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卫道者。

首先他强调为官之人应有的道德品性。林纾虽不为官,但始终关注官场形势,且对为官之人的道德品性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官员的爱国之心是为官之基,由此他盛赞了一大批有爱国之志的官员,这些人,有身怀救国之心的高梧州,有甲午海战为国牺牲的徐景颜,有为百姓谋福祉的林明府……他们心中,真正明确了“为国来不为仕来”的为官之旨。以吴人之妇日日炫其华衣而为盗所杀之事,强调为官当“善藏”——审时度势与韬光养晦的重要性;以贾谊、刘向、董仲舒之不遇,认为官员当以儒者之思想规范自身言行,懂进退,不愤世嫉俗——“忧世之不治可也,愤世之不吾用不可也。”<sup>[2]599</sup>

其次是做人,要承袭传统的儒家道德,以匡正自己的言行。林纾提出,为人当恢复其善良之本性,这同孟子所倡言的人性本善是一脉相承的。在“贤人复性”前提下,便可端正社会风气,大众跟风向之,以此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则可“人人自励以诚节,长养其勇概,”<sup>[2]609</sup>爱国尚武之风便成;做人当有应有的气节,不被君王侮辱,不受卿大夫束缚,不为官吏胁迫。《礼记·儒行》强调“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sup>[14]219</sup>林纾则不主张“有待”,认为“丈夫成仁取义,所争者,仅在毫发。”<sup>[2]611</sup>且君子当“不更其所”“不更其守”“不可辱”“不可夺”,甚至对王铎、钱谦益、龚鼎孳这些变节改仕的清人提出批判,认为这些人理应深受儒者唾弃。

最后是对新文化与新道德孤身抵抗。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在“新道德”与“新文化”对社会、特别是对一大批青年产生影响时,林纾站了出来,力求为传统道德与传统文化留一席之地。在他写给蔡元培的书信中,以恳切的言辞,力求维护

国粹不至于中断:“我公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通播之臣,足见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实望我公保全而护惜之。”<sup>[2]657</sup>他抨击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这些人将国家的落后归根于文化的落后,崇尚西学而否决数千年来的传统,在废八股、去科举、剪发辫等一系列举措未能使国家实现富强后,又以“覆孔孟”“铲伦常”为势在必行之举,实在愚蠢,希望蔡公能于时代变革中“守常”。

### 三

无论是从晚清文人心态出发,还是从整个大时代背景出发,我们都有充分理由去探寻林纾个人在思想杂糅并包、风云时事变迁的年代所做出的选择与蜕变。

#### (一)这种血性,是身体疾病的外现

中医学理论中,人的精神心理与形体生理两大系统是相互作用的,“人有肝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sup>[15]28</sup>受外界因素影响所产生的悲欢喜乐,往往影响身体机能,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19岁这年,父亲身染沉痾,自台湾归来,卧床不久便离开人世,林纾悲恸欲绝。从中医角度言之,“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sup>[15]28</sup>这种消极的心理因素持续不断地刺激肺部导致了病变。“余自二十至三十,此十年中,月或呕血斗余。”<sup>[2]652</sup>这种咯血症状持续了10年,发病时的痛苦可想而知。

在情志变化伤害身体的同时,身体上的疾病又对情志产生了反作用。林纾患有肺病,敏感、伤感、易冲动。中医学理论认为,“肺藏魄”,“肺,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sup>[16]66</sup>正是在这种狂乱的内在心理机制影响下,他生出许多狂异之举,亦因此种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为乡人目为“狂生”,为人所疏远:

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  
列传常思追剧孟,天心强派作程婴。<sup>[8]385</sup>

余病起益困,亲故不相过问,遂恣肆  
为诗歌,乡人益目为狂生,不敢近。<sup>[8]98</sup>

见述庵乃慷慨恣哭,长跽不起,各饮  
满三巨觥,旁人相顾愕眙。<sup>[8]104</sup>

这种张狂与狷介之气,是仗剑任侠的豪情,是

“贫贱坎壈之日，亲戚之形神不接，知交见而奔避”<sup>[8]113</sup>之时对世态炎凉的反抗，也是悲痛时的引吭高歌，与得遇知己时的放声痛哭。

虽饱受病痛折磨，且医生断言疾病已到了不可医治的地步，林纾本着“畏天而循分”的信念，未尝沉沦，反而在有限的生命中，以个人之力为国家与传统文化谋出路。

### （二）这种血性，是时代的反映

在西方国家进入工业革命时，清政府仍然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在世界发展的洪流当中迷失了自己，失去了方向。中英之间由于鸦片贸易而引发的战争无疑给整个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恐慌，在坚船利炮面前，能够应对的只能是毫无战斗力的士兵与“火门透水，炮不得发”的陈旧装备，结局可想而知。

随后的几年，大小战争无数，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漫天飞来，盛世已然不在。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眼见中国的遭遇而坚定地走向了自强，转而挑起战争，成为入侵国，与西方帝国主义站在同一阵地中。“其扩张主义一开始就诉诸武力，比之西人用商品和传教开路，显示了更多的急迫和无情”。<sup>[9]145</sup>屈辱的《马关条约》刺痛着士人的神经，民族意识的觉醒迫使人们睁眼看世界，从过去的美梦中苏醒——若再不求变，当为奴为虏，安能再复往日之辉煌？

有志之士的赤诚之心在时代推动下显得更为火热，他们纷纷为国寻求出路。这些举措皆彰显了士人救世救国之心。同样，学界也掀起一场引进西学之风，在此风气下，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寰志略》等一大批作品涌现出来。这些作品以多种表现形式介绍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科学等，进而让国人清醒认识自身的不足，以求思想的进步。

当此之时，林纾所能做的，则是在文章中反复陈述世情，“发为悲号，以警觉世”，<sup>[2]571</sup>希望能够像杜甫、元结之流，有益于国家与民众。除此，则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三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sup>[2]657</sup>并以中国社会世态人情寓于其中，《黑奴吁天录》中累叙黑奴受虐之惨状，实为担忧我黄种人之将亡；《斐洲烟水愁城录》中言西人尚“非新不学”，我国亦当如此……林之译作影响了一代人，这些作品亦反映其力图能够用世之心。“纾已年老，报国无日，故

曰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摅其胸臆，非敢妄嘶嗥吠，尚祈鉴我血诚！”<sup>[17]94</sup>

### （三）这种血性，源于传统士大夫的文化自信

“文运之盛衰，关国运也。”<sup>[17]146</sup>文化之欣欣向荣与国之富强一脉相连，过去，中华民族一度屹立于世界之林，以广阔之胸襟容纳来自各国的文化，接受多国的友好往来，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而林纾的时代，一幅“山河破碎风飘絮”的凄凉景象，在国贫民弱，列强侵略与压迫的客观现实面前，眼见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被否定、被批判，且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很多知识分子转而崇尚西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这对于传统的士大夫而言是非常痛心的。

由于长期浸润于儒家文化，林纾在教书中对学生的教育亦秉承此旨——“学非孔孟均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值得关注的是，林纾并非泥古不化、排斥西学之人，反而求新求变，认为中西二者并不相互排斥，立倡要将传统与西学相合。西学之昌，可使“旧者既精，新者复熟，合中西二文溶为一片”。<sup>[17]41</sup>要求学堂诸生“恣肆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sup>[17]41</sup>甚至批判那些守旧的腐儒，说他们“酸腐，嗜古如命，又安知有新理耶？”<sup>[17]31</sup>站在一个中等的角度，向守旧派解释西学并不可怕，不会吞噬传统文化的光焰，且传统文化亦有不适应时代发展之处；向全盘西化之人阐释传统文化并不是糟粕之理，应认同自身文化的价值，对新文化运动中所谓的“新道德”与“新文学”也不苟同。这种骨子里的文化自信是林纾的精神信仰。

经典的价值，在于阐发天地之道，从礼乐教化维持社会伦理秩序，承载社会与人生的基本法则，以此而作为大众思想与生活的依据。而传统的“忠孝”与“仁爱”理念，则可凝聚社会向心力。青少年的发展乃关乎国之命脉，故而面对新文化运动提倡废孔孟与伦常，要求全盘西化，林纾力图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一心只求维护封建纲常名教，剖析传统经史子集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申言儒家三纲五常、忠孝及仁爱观之不灭，力求在时代的发展中为传统文化留一席之地，“力延古文之一线”。甚至在临终前向儿子反复交代“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古文学习不可懈怠荒废。林纾的复古，实乃立足于传统文化的价值，秉持一颗救世之心，求应对之策，以回归传统文化本源。

## 四

中华民族是一个尊重文化传统、推崇历史经验、重视价值弘扬的民族。古往今来的士人,在儒家思想的润泽中,承袭前人思想价值,结合个体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在一时代中又成为独特的这一个。林纾诗文形态中所蕴含的思想操守,无论对当时的时代,亦或是当下的社会,都有很大价值。

梁思成曾说:“一个民族的自大和自卑都源于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无知,只有了解自己的过去,才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产生深层的民族自尊”。一时代的士人,本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高度的民族自尊,自觉地把浓浓爱国之心转化为真切报国之行,由此,焉能亡国灭种?

历经数百年的发愤图强,屈辱已然成为过去。站在时代发展的今天,我们发现,无论是战乱纷飞还是平安安定,国民的忠义之心是不可或缺的。艰难的日子里,正是因为爱国之赤诚所形成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才不至于中断。现在,我们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正是出于民族自尊,希望国民在新时代里自尊自强,砥砺前行。

文化自信为民族自信之源。中华民族于世界之林中历经千年生生不息,积累了丰富的文化成果与丰厚的智慧结晶。而经典实为文化之根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林纾的主张的确是保守的,然而,在大时代的驱动下,他虽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但坚持了传统文化中应当坚守的,即使在别人眼里是以卵击石。

林纾言“获理适道,亦不惟多读书,广阅历而然,尤当深究乎古人心身性命之学。”<sup>[2]566</sup>所谓深究“古人心身性命之学”即要求重温经典,以先哲之训,体悟天地自然之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经典的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新的时代环境下,如何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成为我们肩负的使命。我们当站在前人对经典反复阐述成果的肩膀上,沿着古人弘道的步伐,立足当下社会环境,深挖义理,使其中宝贵的价值不至于陨落。

踵事增华,勿忘初心。今天我们重提血性这种性格气质,旨在让人们充分认识到此类气质所显现的思想操守,通过读书求学和道德实践,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内在品格等各个方面都能得到发展,进而在全社会形成一股正能量,为社会的进步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参考文献:

- [1] 龚自珍,孙钦善.龚自珍诗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 [2] 清代诗文集汇编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 775 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3] 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卷二十九[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 吕岩.吕子易说卷下[M].清乾隆曾燠刻本.
- [5] 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 2[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 [6]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 冉苒.唐宋诗醇[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
- [8] 林薇.林纾选集·文诗词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 [9]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10] 王水照.历代文话·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 [11]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 [12] 朱羲胄.民国丛书第三编 76·林畏庐先生年谱[M].上海:上海书店,1991.
- [13] 薛绶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 [14] 崔高维.礼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 [15] 何文彬.谭一松.素问[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8.
- [16] 苏颖.黄帝内经灵枢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17] 钱谷融.林琴南书话[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许秀清)